



艺术教育如何扎根中国大地？

□ 高世名

在2018年9月10日的全国教育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”。对艺术教育界来说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与他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、紧密相连。2014年，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，对社会主义文艺观作出了全面深入的阐发，其中最核心的精神就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中国大地，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，深入时代现场，融入人民生活。艺术教育如何扎根中国大地？如何落实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艺术理念？这是艺术教育界最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。

以人民之心养护艺术之根

中国文艺界一直有“采风”的传统，倡导艺术家们走出画室，深入社会、体验生活。“采风”传统最早可以上溯至《诗经》时代，《诗经》里的“国风”就是通过“采国风”即收集各地民间歌谣而成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讲：“《书》曰：‘诗言志，歌咏言，’故哀乐之心感，而歌咏之声发。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故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可知古代采风，是为了观风俗、知民情，以正为政之得失，是执政者了解世情、感同民心的重要方式。

在二十世纪，古老的“采风”传统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洪炉中转化成为革命文艺的重要支撑。1942年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说：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，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，是粗糙的东西，但也是最生动、最丰富、最基本的东西；在这点上说，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。”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引下，“采风”进一步成为文艺深入生活、深入群众的行动，一代革命艺术家们“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、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”，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。

接续延安文艺传统，新中国成立

后几乎所有艺术院校都在教学体系中设置了“下乡采风”课程。艺术学子们一年一度，离开学校奔赴田野，到火热的生活中、到人民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学会用新社会的世界观和史观去观察生活、理解社会、表现人民。“下乡采风”成为艺术学生贴近现实、体验生活的重要途径。

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、也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既是历史的‘剧中人’、也是历史的‘剧作者’。……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，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，有血有肉，有情感，有爱恨，有梦想，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的理解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洞见，从这样的人民观出发，艺术所要表现的生活就不只是外在的现实表象，而是我们真切地卷入其中的有切肤之痛的身心经验。要想真正建立起生活的经验，就必须引导青年学子们学会用身体丈量历史，用生命感触世界；将自我充分投入到生活的现场、现实的深处，在当代人的生活现实中树立艺术教育的社会关怀，将个人创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连，以人民之心养护艺术之根。

“以乡土为学院”

近年来，中国美术学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”的理念，“以乡土为学院”在乡土文化和社会进程中去感通人民之心。一方面，改造美术学院下乡采风的传统，通过田野工作开展“社会素描”，把下乡采风深化为有方法、成系统的现实行动，推进艺术的社会感知与社会参与。另一方面，在城、乡、市、镇设立星罗棋布的“乡土学院”研学基地，形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社会网络。其目的是把中国社会发展的“最前线”作为艺术人才培养和艺术家自我实现的大现场，继而打通学科的知识、社会的知识和生活的知识。

扎根中国大地的艺术教育，并不只是“艺术下乡”“设计扶贫”或当代艺术所谓的“社会参与”，甚至也不只是狭义上的“社会美育”，而是一个艺术教育与乡土社会双向塑造、互相成

就的过程。在此，我们更强调“从乡土中学习、在乡土中学习”。作为艺术教育者，我们需要思考：如何从吾土吾民的真实生活出发，去实践一种与学科体系全然不同的自我教育、自我生产的社会系统。这就需要我们z从乡土社会中去体验、去学习另一种言说与创造的方式，另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，另一种交往伦理，另一种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。这是使艺术回归到真实生活世界的途径，也是艺术学院突破“学术工业”知识生产的途径，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教育自主建设的途径。

艺术院校的学生往往比较关注自我、注重个性的表达，对此我们要引导他们在社会大现场中打开胸襟，用乡土新经验贯通群我。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，就是要培养青年学生对中国社会的感知力和认同感，提升他们的社会关怀与家国情怀；也就是要培养充分融入日常生活的艺术理想，开展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艺术教育。

构造“乡土中国”的社会档案

以乡土学院网络建构起感知社会、参与社会的毛细血管，师生们“下乡”就不再是简单的写生采风，而是以扎根社会的深度和广度，对当代社会生活进行全景式感知和显微式剖析。在学生四年培养的全过程中，分年级设定乡土实践教学目标：大一是价值观和问题意识的培养；大二是技艺与方法的训练；大三是艺术语言的综合运用；大四创新成果的形成。根据分年级的培养目标，低年级聚焦价值观教育，着重于社会感的养成和问题意识的唤起；高年级结合社会美育、乡村振兴、教育帮扶等具体项目开展社会实践，并强化社会实践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嵌合关系，形成课程设计上系统性和贯通性。

在乡土学院研学，学生们需要深入村镇社区的现实肌理，深入乡土生活的日常场景，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。他们通过实地讲解、考察调研、口述史采访等各种形式，以“一生一本”为载体完成在地研究；通过项目

任务、现场作业、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，提炼当地的传统工艺、地方知识、民间记忆，扩充多样化的艺术知识。力求做到五育融合、身心发动，用鲜活的经验磨练感受力，用生活的常情常理提升判断力，用生活的真实加深表现力，用丰富的生活百态打开想象力，用民间的智慧激发创造力。

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有一些真实而独特的知识，那是源于百姓日常生活的情感、经验和思想意识，体现着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与生活智慧。这些年，中国美术学院以强烈的现实情怀和主体意识，率先建立了民艺博物馆，创办了全国首家手工艺术学院，致力于传统手工艺和器物美学的复活、本土空间的营造以及乡土文化的重建，旨在复兴中国本土的生活方式和艺术经验，试图建构一种符合人民当代生活需求的生机勃勃的“新乡土”。

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，中国美院的师生们以乡土为学院，以形形色色的艺术方式开展了一系列乡土社会的实地考察。他们寻找、挖掘乡土故事与人民记忆，呈现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，持续地梳理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，构造“乡土中国”的社会档案。

以乡土为学院，中国美院师生团队以持续的实践热情、优质的艺术与设计资源，深度对接乡村振兴、城市更新和美丽中国建设，发掘出“城乡片段”“存量建筑”“乡土修复”等艺术新命题，形成了“自然建造”“生态织造”等设计新方法，总结出“山水城乡”四方融合、“文教商旅”四维联动的发展新模式。通过这些新命题、新方法和新模式，我们正在逐渐建立起一种扎根中国大地的现实路径，去培养乡土活化的情感和基础，去构建特征鲜明、活泼生动的乡土生活，去创造一种与人民血肉相连、感同身受的艺术和教育——这种艺术是大写的艺术，这种教育所塑造的是大写的人民。（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）

“教育”论坛

君子之道早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典范。而在君子的德行中，“勇”又受到相当的重视。《论语》有“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”，至《礼记·中庸》，又有“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”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勇，气也，从力甬声”，把勇看作是一种能够激发行动力量的“气”。中国古代文化中，一方面，“勇”的观念与战争时代的背景紧密关联，如《曹刿论战》中说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；另一方面，“君子之勇”的内涵随着儒家圣贤的诠释和践行，也展开了十分多元和丰富的维度。

君子勇而有仁

儒家思想体系中，“仁”乃全德，统摄其他所有的君子之德。换言之，真正的君子之勇，是统摄于仁的目标之下的，是为实现和维护仁义而产生的顽强刚毅的意志。

孔子提出“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”，划分“勇”为“积极的勇”和“消极的勇”，强调“勇”对君子人格不可或缺，同时也表明了人们通常理解中的勇者，内心不一定全都具备仁德。只有勇且有仁的那些人，才称得上是君子之勇。

孔子敢于不畏艰难险阻，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，面对陈蔡绝粮和匡地被围的绝境，依然弦歌不辍；孟子敢于挑战权威，保持从道不从君的士人风骨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；司马迁面对李陵被俘、汉武帝盛怒，在别人喙若寒蝉时敢于出面舍身辩护；文天祥面临多次劝降，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毫不动摇慨然赴死……究其根本，皆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“仁”的信念的笃定不移，以“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为人生信条。

在程颐程颢看来，勇是智、仁得以开展的不可缺少的环节，是智、仁修身功夫能否践行的关键。智与仁的到来，需要“勇”的推动，勇的真正功能便是守护“智与仁”。事实上，儒家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底色便是“勇敢”，不预设结果、不害怕失败，果敢坚定只为守住心中的正道，甚至会置生死于度外而舍生取义。

君子勇而有礼

随着“勇”的观念的普遍化，其内涵也日益丰富。人们逐渐将“勇”纳入“礼”的范畴讨论，指出缺乏礼的指导和规范，以血气论勇、以武论勇，“勇”就会生乱。子贡问孔子“君子亦有恶乎”？孔子回答君子厌恶的几种人里，就包含了“勇而无礼者”。

众所周知，孔门弟子中子路以勇敢著称。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”，“由也好勇过我”说的都是子路之勇。在子路问到“君子崇尚勇敢吗”时，孔子说：君子把义看作是最尊贵的。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，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去做盗。

事实上，子路之勇是外发之勇、血气之勇、勇武之气，表面上看是一种值得赞美的道德，事实上却是君子需要戒惧、警省和超越的。君子崇尚“勇而有礼”，因为“礼”所表达的，是一种敬畏之心。勇而有礼，恰恰说明君子之勇并非自大狂妄，而是在敬畏的同时有所力承担。比如周礼中的军礼，规定诸侯之间的征伐必须找到对方不义的理由，同时不能在对方处于国丧、自然灾害的时间段出兵，即便战争胜利了，也不能杀死伤兵，不可把老年人当作俘虏等。孔子生逢乱世，礼坏乐崩，社会秩序不断瓦解，他对于勇而无礼者可谓深恶痛绝，因此重点强调尚勇的前提是礼的约束。

君子之勇乃大勇

勇有大勇和小勇之分。孟子就曾提出“小勇”“大勇”之辨。他认为“小勇”即匹夫之勇、一夫之勇、血气之勇，“大勇”即文王之勇、武王之勇，目标在于除暴安良、安天下民。“小勇”受情绪、忿怒驱使，是情欲动心而心失其正的血气之怒。由此可知，君子之勇一定是大勇而非小勇。一言不合，拳脚相加，就是匹夫之勇。因为只要有几分血气和力

君子之勇

□ 车凤

气，不需要有任何志向和修养，这样的勇很多人都做得到，所争的不过是一时意气，所求的不过是一己私利。而君子之勇，是使命担当，是心怀天下苍生，是苏东坡所说的“其所挟也太大，其所致也远”，是鲁迅所言的“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。

另外，君子之大勇其实还包含了“每临大事有静气”的沉着和定力。《庄子·秋水》中曾这样列举和比较：“夫水行不避蛟龙族，渔父之勇也；陆行不避兕虎者，猎夫之勇也；白刃交于前，视死若生者，烈士之勇也；知穷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时，临大难而不惧者，圣人之勇也。”

自古以来的贤圣之人，也正是君子之人格进阶目标所在，无一不是内心强大之人，越是遇到惊天动地之事，越能心静如水，沉着应对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，正是基于对天道的了悟和通达。

知耻而后勇

儒家的人格修养追求，根本上而言是要人“向内看”。君子慎独，面对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”，敢于时时克己省察，向自我“动刀子”，深知“仁者先难而后获”，首先要面对的是真实的、不完美的自我。

君子之勇当然也包含了在物质和利益的绑架中能够脱身而出，典型者如孔子的爱徒颜回：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。从内在精神境界看，颜子不能不以贫贱富贵累其心，就是一种难得可贵的勇。

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将“颜子之勇”直接联系起来讨论了十几次，认为颜子是“大勇”人物。其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颜子意志深厚不浅露、默识心融，不似孟子鏖辩好辩，“圣人体段已具”。二是颜子自反常直、克己省察、慎于持身，表明“颜子大勇”是对自己心灵的安顿，是内在生命的体知，关乎自己的德性，带有强烈的生命意志突破色彩，是真正的勇。

同样的，君子“知耻而后勇”，敢于承认和面对自己的缺点也是需要勇气的。普通人常常碍于颜面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，有时则是压根不敢面对自己的缺陷，总是想方设法回避。相对而言，君子的道德功夫在于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人格境界。“日新之谓盛德”，因此才能“日三省乎己”“闻过则喜”，坦坦荡荡。正如子贡所说，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君子之勇，是因为他们着眼的是自己人格的突破与提升，并不怕颜面有失。

君子之勇，是君子仁爱、礼义、自省自律、诚意正心的人格呈现，也是君子在漫长的成长和自我锻造中铸就的磅礴之力。

我看君子文化

书院为什么能够延绵千年而不绝

□ 王 琦

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，不仅在中华文明传承、学术创新、人才培养、服务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而且流传至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越南等地区，对儒教文明、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书院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延绵千年而不绝？其独特的精神与价值是什么？钱穆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说：“宋学精神，厥有两端：一曰革新政令，二曰创通经义，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。”这段话虽重点谈的是宋学精神，但却揭示了书院在其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和社会发展变革、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密切联系。其实无论是宋明理学、阳明心学的兴起，还是乾嘉汉学、清末实学的发展，均是以书院为研究或传播基地；而引领历朝历代政治、文化变革的众多士大夫，如范仲淹、朱熹、张栻、陆九渊、王阳明、湛若水、高攀龙、顾宪成、惠栋、钱大昕、曾国藩、左宗棠等，他们或主持书院，或于书院讲学，或为书院培养人才。正是因为书院的存在，从而造就了一代代独特的政治、学术与文化风貌。

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在《岳麓书院记》中提出了“盖欲成就人才，以传道而济斯民也”的办学宗旨；朱熹撰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学规，强调为学修身、处世接物之要，认为书院教学当“讲明义理，以修其身，然后推己及人，非徒欲其记览、为词章，以钓声名、取利禄而已也”。张栻与朱熹这种力图通过对经典、文化的创造性诠释与传承，培养不汲汲于功

名利禄，而是接续“道统”与“正学”，心怀家国天下、经世济民之才的教育理念，成为历代书院尊奉的圭臬。明代中后期，随着儒学的转向与“下移”，不仅书院向平民开放，而且出现了许多乡村书院，其化民成俗、教化大众的功能进一步增强。可见，书院之所以历经千年而弥新，就在于其能够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，通过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以“文”化“人”、以“道”正“人”，从而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、文脉不绝，并渗透到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维系世道人心，化成天下，这乃是中国书院的精神与价值之所在。

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征途中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书院，又该如何开拓创新，走向未来？

明确文化定位，传承而不固守，开拓而不忘本。传统书院的兴起和发展是对时代与社会问题、文明传承与重建、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回应。因而在当今世界，无论何种类型的书院，均要直面时代需求与世界发展潮流，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“正”的同时，广泛吸收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，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，增强其适应性、现代性，服务于中华文化重建、民族复兴、国家富强、社会和谐与个体发展，承担起以文化人、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。虽然世易时移，书院文化传承的内容、创新的深度或传播的方式等会有所变化，但传统书院的

精神内涵与人文价值却始终值得我们传承与发扬。

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新媒体的融合，突破时空限制，建构书院文化传播的新范式。传统书院的传道授业与文化传播，其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方式主要靠师生面对面传授、辨难，或师生弟子之间口耳相传、著书立说，即使打破地域与学术壁垒的“朱张会讲”等文化盛事，虽有“四方之学者毕至”而致“饮马池水立涸”的盛况，但其文化传播的范围也只有上千人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、网络技术与大数据平台，采取“线下+线上”“文化+融媒体”等方式，则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让有着不同个性、不同兴趣爱好、不同地域的人群，通过网络直播平台，自由选择并聆听不同学派的专家、学者的思想观点与治学心得，从而以一种更为便捷、广泛、高效的方式传承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影响社会大众，提升传播效能。

打造全方位传播矩阵，形成文化传播“合力”，拉近学术与大众的距离。在网络化、数字化时代，要拓展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，通过现场互动与网络直播的形式，传播、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虽然能够形成即时的热度，但却缺乏持续感染力、引导力与影响力。因而还需全方位打造立体的传播矩阵，通过“中央媒体+省级主流媒体+市县级媒体”的形式，将国内外一流专家的思想观点与学术精髓层层扩散，深入到不同的受众之中，扩大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。同时，

采取“微博+微信公众号+短视频+书籍出版”的策略，设置讲坛回看、精彩瞬间、媒体聚焦等栏目，实现多次、反复的传播，并根据各书院的文化特色设置经典导读、国学课程、文化纵横等丰富的传播内容，提升文化传播的质量与趣味性、互动性、选择性，从而陶冶情操，提升受众的文化素养，构筑精神家园。

促进书院与文旅有机融合，赋能地方经济文化发展，扩大社会影响力。书院大多建在名山大川、风景优美、适合怡情养性之处，有着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，如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山下、汨罗屈子书院处在玉笥山麓与汨罗江畔之间，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的五老峰下等，且中国各省市各种类型与层次的书院众多，可因地制宜，依据其资源与文化特色，构建书院联盟，打造合适的省内、省外的旅游路线，实现互相引流。同时通过文化品牌的打造、各具特色的研学活动的开展、主题活动的举办、文创产品的开发，甚至“云上书院”资源开发与共享，提升书院的知名度与文化内涵。打造目标打卡地，提升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，赋能地方经济文化发展，实现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，激活传统书院的现代功能。（作者系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）

首届书院文化论坛 征文选登